



为平民献出 全部产业和生命的 郑佑之

□文/何蜀

1931年12月30日中午，三个“共案”犯被国民党军阀当局杀害于重庆上罗家湾刑场（在今重庆市少年宫和儿童医院对面）。为了防止他们呼喊口号或作讲演，当局事先将他们嘴里塞进了俗称咬牙棒的“锁口符”。但他们仍然用吼声哼起了《国际歌》。三人中的为首者，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郑佑之。

重庆《新蜀报》第二天对他们的被害作了报道，文中说：“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思之称”。

郑佑之原名郑自申，佑之是他的别号，党内化名张荣山。他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人称“川南农王”。他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他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开展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活动。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

么这样！高说这是“中央”的意思，并立即发电报告卫立煌。

蒋介石早就想除掉石友三，听到这一消息，当即由卫立煌传达了一道“就地正法”的命令。高树勋他们也怕夜长梦多，便赶快将石友三处决了。时在1940年11月。高树勋打报告离职休养，未准，被晋升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郑佑之从1928年2月在重庆成立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时就是省委委员。地下党内更熟悉的是他的外号：“第二马克思”、“卡尔”、“农王”。

从1930年起，军阀刘湘为了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利用共产党叛徒作为骨干，建立起了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1931年2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叙：“叛徒猛烈进攻。江巴叛变先后共二十余起。在江巴及二十一军防地作了空前破获。如江巴几次捉人……因此省委与叛徒斗争成了中心问题。”不久，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破获了地下省委秘书机关，省委被迫迁往成都。

郑佑之奉命留在白色恐怖的重庆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这年7月，因川东特委书记被捕，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缩小战线，另建江巴中心县委，郑

石友三那个帮他与日本勾结的弟弟石友信，听到石友三被扣的消息，到石友三的部队问罪，被毕载奕的副官开枪打死了。

石友三一直把毕载奕当老乡、亲信，实际上毕是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

责任编辑 苗士

佑之又被留在重庆任中心县委书记。

在这期间，郑佑之为了对付危害极大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通过他单线联系的两个地下党员，在特委会中分头串连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建立起了为地下党控制的秘密组织良心会。良心会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购买武器，营救被捕人员，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在特委会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大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郑佑之这时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中最年长者：40岁。在当时四川的共产党人中，他是最早觉察到中央（王明）路线有问题的一个。凭着他长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凭着他多年从事基层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他越来越发现那时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不符合社会实际。

但是，在他影响下的川南党组织提出“以赤色区域包围城市”（与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谋而合）的战略思想，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落后意识”；他向上级领导提出注重农村工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却遭到责难。他请求去农村工作，却被扣上“右倾逃跑主义”、“农民意识”的帽子。当时领导干部普遍年轻，面对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感情上易受左倾路线影响。当年担任江巴中心县委委员的陈震在多年后回忆郑佑之时说：

“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党内居于

少数地位，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感到有些苦闷，其他的同志也认为他有些别扭。”

尽管如此，郑佑之仍然忍辱负重，千方百计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作准备。

在这方面，他充分利用了他所掌握的二十一军特委会良心会的力量，通过一些为了搞钱不惜冒险偷卖枪支的二十一军军部官员，设法购买到10枝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德国造20发快慢机手枪。

不料，就在此时，1931年12月下旬，郑佑之与良心会之间的联络员，地下党特务队的一个队员自首叛变，被他出卖的地下党、地下共青团机关人员中又相继有人叛变，于是引起一系列连锁破坏事件。

这时，只因出身好而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江巴中心县委负责人却强令郑佑之到重庆城内桂花街的秘密联络点去作例行“接头”。由于良心会遭到破坏，郑佑之煞费苦心在那叛徒窝中埋下的内线全部报销，他再也无法得到内部消息。但是，他从接踵而至的人员被捕消息分析，那个联络点必定已处于危险之中。他提出取消这次接头，却遭到批评。

郑佑之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为防不测，藏了一把快慢机手枪在身上。但他没想到，该联络点的工作人员袁世勋（牛皮函小学教师）已在头天深夜被捕并旋即叛变，交待了郑佑之这天要来联络点的情况，并已带了特务们埋伏在家里等候。黎明前，郑佑之去到该联络站即落入陷阱。

郑佑之是早就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的。早在1923年，他在写给被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小妹妹李坤泰的信中就说：“我自料我还活十来年就该死（不遭人杀死，便该累死）……”但是他反对作无意义的牺牲。在另一封给妹夫肖简青的信中他说：“我的生命已决定为国民，为无产阶级牺牲，不过逃得脱死的时候，我还是要逃（不找死罢了），不能束手待毙的。”

郑佑之被捕后，极为镇静，他给亲人留下了遗书，从容走向刑场。与他一起被杀害的是两位良心会成员。

郑佑之烈士胞弟郑瑞符在郑佑之牺牲半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赶到重庆，经好心人帮助，在长江南岸铜元局后面

毙命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侵华日军将领

□文/翁树杰

元泉馨原是日军驻山西长治的独立第十四旅团少将旅团长。

在侵华战争中，元泉馨多次带领部队扫荡解放区，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对山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按说，元泉馨已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然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了，元泉馨尚不是侵华战争的主谋策划者和决策者，只要能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中国人民是不会把他作为战犯处理的。他也可以和许许多多的日本军官一样，被遣送回国和家人团聚，重新开始战后的和平新生活。

但是，元泉馨中武士道的毒太深了，对日本的战败投降痛心疾首，自认为无颜回国见亲人。他不是把侵华战争的失败，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是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的顽强抵抗。在接到投降命令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高喊要报仇。

就在这时，“山西王”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布置接受日伪军投降的事宜。

善堂所捐的公墓地带找到了郑佑之遗体，他强忍悲痛，将烈士遗体抬到长江边上，请人摄影摄像，另行购买衣棺装殓。这时距殉难时已20天，又正值腊雪纷飞，水寒冰冻，郑瑞符抚郑佑之遗体时，竟见伤口鲜血直流，旁边目睹的人，都连声称奇。

回到太原当天晚上，阎锡山即和山西省的汉奸首脑举行联席会议，第二天由伪省长王骥继续发布告示：“奉长官阎命令，一切照常办行，不得消极怠工。”并将5万多名伪军全部改编为“省防军”，委任5名大汉奸为他的高级顾问。

即使这样，阎锡山还感到力量犹为不足，又会见了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淙四郎，希望能把山西境内日本军队悉数改编，以协助第二战区的“剿共”战争，并封了澄田淙四郎一个头衔，叫第二战区总顾问官。

澄田淙四郎慑于《波茨坦公告》，不敢公开下令日军参加“剿共”，建议阎锡山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组织中日携手的“合谋社”，发起“残留复仇”运动。元泉馨和城野宏、岩田清等一批日本军官，在“复仇复国”的号召下，纷纷参加了“合谋社”。他们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有一万多名日军换上了国民党的军装，将武器上的“菊花”标志抹去，打上山西军的“晋”字钢印，改编为一个保安总队和6个护路大队（1947年夏，又合并改编为暂编第

郑瑞符雇船载枢返乡，船过江津时，时任县长的荣县同乡谷醒华（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竟不顾自己的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亲到船上吊唁，并赠送旅费。可见郑佑之在川南一带的声望之高。